

← (上接10版)

不必费老大的功夫学习汉语。我的同事们并没有加拿大人不该研究加拿大问题的意思;我也没有中国以外中国问题的研究应该由中国人包办的意思。但他们所说的有点道理。我既然搞完了我的“事业”,不必讲中国问题来找饭吃,又同时得找点事情做,于是我决定再学一种语言,走进另一个园地。如果我走进的是英国问题,我的那些同事还可以认为我在欺骗人,所以我才选了德语,研究现在我住的地方。看看这个小城的近代史,从战争、外国占领,到独立繁荣,这是两万三千人的奋斗成功史。

我说这个城,其实是两个城。其间从前有一个小村,名为“Und”(即为英文的 and,“及”或“和”的意思)。克雷姆斯(Krems)比斯太因(Stein)大,工商业更为繁盛,这一段多瑙河(Lie Donau, ilu Danube),从此地开始上溯到麦尔克(Melk),是寂美的一段,而与小城老而且美,中古时候从北方小山区向南发展,到了平地就停止下来。形成一条大街,距河也还有一段路,那到18世纪以后才开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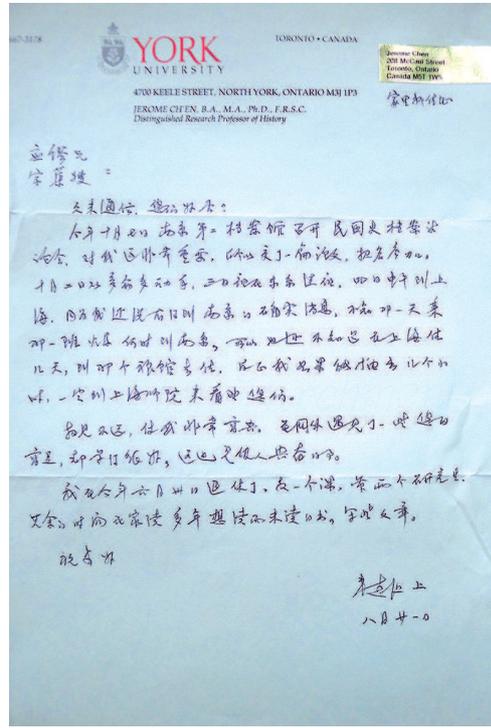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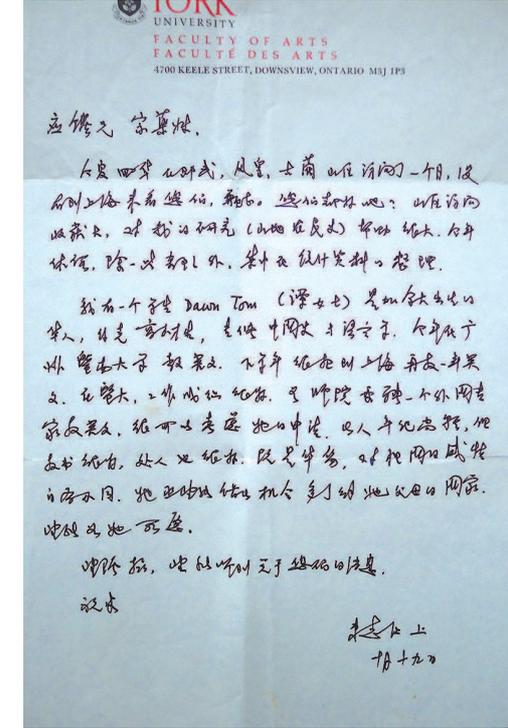
我住在斯太因的一个山谷中,每天到克雷姆斯的博物馆去读旧报纸,将来读文教档案,以1945后十年为期,希望两年内搞完,然后回加拿大去思索和编写。

我在这里有时看见日本游客,只有一家中国饭店。常常想到您。这里到维也纳和布拉格都有好几班直达车,到这里来玩,我一定为您们导游。

祝健康、顺利、快乐!

陈志让上

从这封信里,不难窥见陈



陈志让致程应镠李宗莱夫妇的函件

志让争强好胜的学术雄心。他在“不必讲中国问题来找饭吃”之后,却告别轻车熟路的国史研究,决心“走进另一个园地”。为向西同行显示自己的实力,他有意将英国问题摒除在外。在他看来,自己在伦敦大学拿的历史学博士,又相继在英国与加拿大执掌教席,英语不期然已是第一语言,即便在英国问题上取得成果,也不值得骄人一头。便以古稀之年“再学一种语言”,闯入德国城镇史研究的新领域;而新学的德语也能很快熟练地用于史学研究。这种不知老之将至的学术拼搏劲头,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。

1994年夏,流金师逝世,陈志让仍与师母邮筒通问。1995年岁末,他按例致函

贺年,还托人致送了个人新著。在这封长信里,他谈到退休八年间的学术研究:

我今年九月到巴黎去看了四天,看了三个博物院,其中一个就是这本小书的主题。巴黎太贵,住了四天就跑到意大利去了。我也在美国住了两个星期。

我又开始写书了——写的是奥国一个小城的历史。研究工作已完,以两年为期,脱稿。这是我在国外五十年第一次写非中国的题目。写得要是不够水准,就只好“藏之名山”,转过头去写一本关于80年代人的社会文化史。

倘若对照上一封信,此信所说“写的是奥国一个小城的历史”,是“在国外五十年第一次写非中国的题目”,即其八年前信中提及的那座小城。因专

业隔阂,笔者不知他这部史著究竟已付梨枣,还是藏之名山。但令人感兴趣的是,陈志让在信里对中国社会最新变化袒露了肺腑之言。他对师母说:“应镠兄仙逝了,我们也老了,回顾八一年上海的气氛,使人十分感慨。”言谈之间,对1980年代前期的气氛深表怀恋。他紧接着说:

我常把我这一代的留学生叫做“50年代的人”,而把年轻的叫做“80年代的人”。我们的差别很大,但在接受西方(主要是英语国家)的文化上,却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。

然后,陈志让将其所见的80年代负笈北美的中国学人(包括留学生与学者)分为两种类型。一类学人“生活在加、华两种人的朋友之间,了解加拿大社会”,他们虽然搞中学,也了解西方,看似中西兼得,但两方面对他“无用者一概不问”;这类学人即便“跟加拿大女人结婚也是这样,治学也是这样——洋为中用”。另一类学人“则在唐人街,自己烧饭,上中文图书馆,只读中文书,只上中国人开的店买东西”。陈志让分析说,初看上去,这两类中国学人“一如昼夜的不同样”,但对西方与西学的态度却并无二致,那就是“以用为主旨”,“对西学的态度却是‘洋为中用’”。陈志让料想,这两类学人“恐怕一本关于加拿大的书都没念过”,对他们来说,“加拿大的意义完全因为有中国,所以加拿大才有意义”。他由此引发一通评论,措辞尖锐却令人反思:

加拿大不能为了加拿大而有意义,艺术不能为了艺术,科技不能为了科技,一头小猫不能为了他【它】自己……所以“洋”只能为了“中”才有意义。

结婚只能为了生孩子(或革命)才有意义……谈到这里,也许我们可以了解,为什么中国人在知识上追求与成就,受了那么大的限制!

很少几个留学生了解西方。唐人街的中国人更不了解西方。

谈及唐人街,陈志让更是不无幽愤地指出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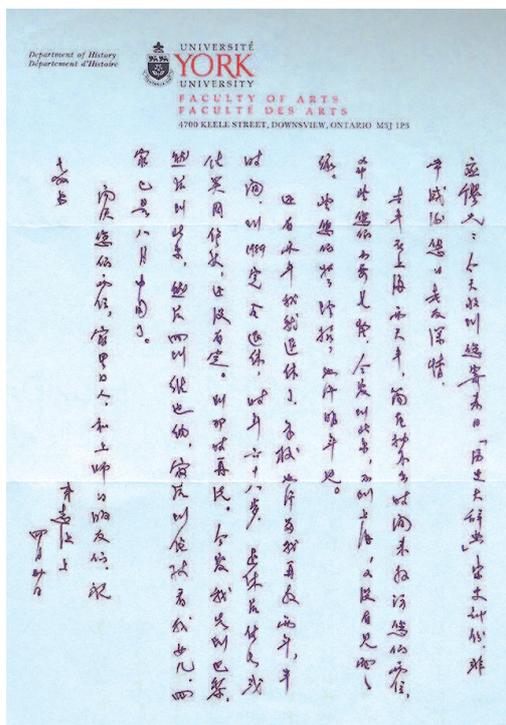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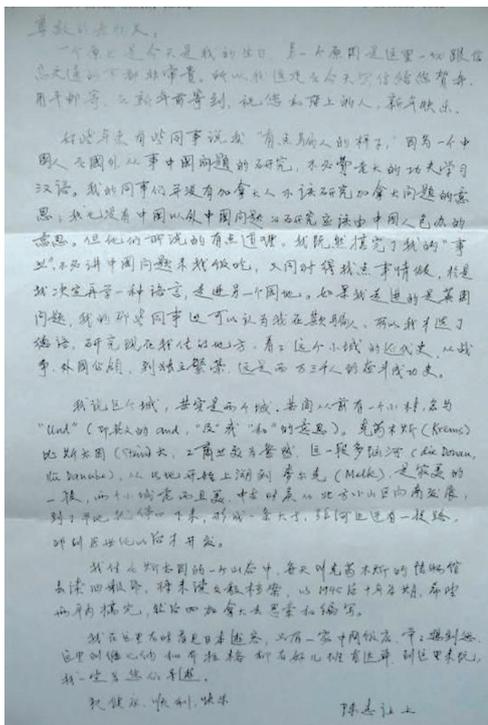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个美国友人说:“中国的长城没有能阻止外国人侵入,他阻止了中国人出去。”这是很对的。唐人街的中国移民都是这样的。

他的感慨因国门开启后两类留学生而触发的,在他看来,无论这两类中国学人之间,还是两类中国学人与唐人街的中国移民之间,在了解西方上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。据其拙见,恰是执著实用性的“洋为中用”,在中国人意识深处垒起一道自我封闭的无形长城,即便人到西方,依然无法真正了解西方,无论是出入大学区的学人,还是打工唐人街的移民。这种自我闭锁的文化心态,与他下文提及的“单文化”互为因果,却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心防。陈志让反省自己那一代与年轻这一代“在接受西方(主要是英语国家)的文化上,却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”,而无论为国,还是为己,急功近利的“洋为中用”恰是症结所在。他虽没说自己是超越前辈的异类,但至少在晚年对“单文化”倾向已有清醒的警觉,对任何实用主义的“洋为中用”更是持反对的态度。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,对90年代初期再次高涨的出国留学潮来了个醍醐灌顶:

(我)这五六年来的全是关于欧洲近代现代的书,英文与德文的书,不懂法文,这是一个障碍。中国有志于人文学科的人,一定要擅三四种语言,单语言单文化的人在信息交通这样频密的世界,搞自然科学还可以,搞人文学科真是毫无前途,“出国、留学”更不过是“镀金”而已!

从80年代最后那年起,陈志让没再回过中国。但正如他所说过,“对祖国的感情自有不同”,在致函老友时不仅乡愁未淡,反而忧心更切。他在信里明确反对“洋”只能为了“中”才有意义,让人想起他在《军绅政权》里对近代以来“中体西用”论所持的异议。上引他那些深刻的议论与犀利的批评,所指涉的当然不仅限于中国留学群体;似乎也在表达更深的关切:开放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转型中如何避免一再蹈袭“中体西用”镀金式的迷径?

(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


陈志让致程应镠李宗莱夫妇的函件